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第 12 卷　第 1 期　頁 43-77　2016 年/春季號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2, No. 1, pp. 43-77 Spring 2016

凱末爾語文改革、國族想像及改革實踐評估*

蘇凰蘭
美國雪城大學歷史學系客座助理教授

摘 要

本文主要整理土耳其文字語言與政權轉移的歷史，其與 1920-30 年代土耳其國父凱末爾阿塔圖爾克所領導的國家語文改革間的歷史承繼關係，並分析凱末爾語文改革的意識形態、規劃、實踐與評估。本文基於 Benedict Anderson 印刷資本主義的概念，論述土耳其共和國官方如何再生產知識、善用印刷文化、以及統一語言文字，來讓其塑造的土耳其國族想像共同體成形，並進一步地推廣以國家力量主導的、培養民族思想的、政教分離的現代「土耳其人」教育，使得現代土耳其語及其羅馬字書寫的推動能有效率地進行。

關鍵詞：凱末爾、土耳其語文、國家語言改革、羅馬字、印刷資本主義、想像的共同體

---

* 原發表於台灣國際研究學會主辦「躍升中的土耳其」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科技與工程學院 3 樓會議室，2015/10/17。

壹、前言

土耳其語（Turkish language）是突厥語（Turkic languages）的一支[1]，屬於烏拉爾-阿爾泰語系（Ural-Altaic languages），與日語、韓語、蒙古語系語源關係密切。其主要使用人口遍佈於土耳其共和國（Republic of Turkey）、德國（Germany）、保加利亞（Bulgaria）、塞普勒斯（Cyprus）、羅馬尼亞（Romania）、馬其頓（Macedonia）、希臘（Greece）以及其它歐洲與亞州地區；中國地區則大部份聚集於新疆、蒙古等地。土耳其人口在 2015 年約七千八百七十四萬人（Wikipedia, 2016），再加上境外與海外土耳其裔移民，目前全世界土耳其語使用人口，應超過一億五千萬。

如大多數語言學家普遍認知地，現代土耳其語的特徵有著元音和諧（vowel harmony，詞根元音與詞語後綴變化一致）、黏著語（agglutination 利用詞尾變化，實現語法功能）、缺乏語法性別、句法詞序為主賓動（S-O-V）等特色（Öney & Durgunoğlu, 1997: 1-15）。這些現代土耳其語言特色，並非跨世紀累積使用的結果，而是 1920 年代國家語文改革的延續成果。

現代土耳其語的歷史並不長。若是由土耳其共和國國父凱末爾阿塔圖爾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 1881-1938）從 1928 年一連串的語文改革算起，現代土耳其語歷史尚未超過一百年。在凱末爾大刀闊斧地推動國家語文改革之前，鄂圖曼帝國及其之前的語言使用與政治發展，很值得關切。因為那關係著凱末爾改革的緣由；而舉凡語文改革，皆是對現有語言規劃、政策不滿意，而令改革者發起改變現況的運動。無論凱末爾改革動機為何，我們皆應仔細審視改革前土耳其地區的語言與文字使用概況、土耳其族群遷徙、帝國政治發展簡史。這些對土耳其語言史的觀察，將有助於我們更進一步地理解 1920 年代以國家力量所推動的土耳其語文改革，其前因後果，以及改革成效。

本文主要論析土耳其語文使用與國家政權之間的關係，強調語文改革與培養國族「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Anderson, 2006）

[1] 有關於「土耳其」與「突厥」的稱呼，請參考葉俊呈（2013：17-18）。

之間緊密的聯繫，以及官方如何有效率地使用國家機關的力量，實踐改革。

本文的架構為第一節介紹全文總旨、現代土耳其語文特色與全文結構外。第二節說明土耳其共和國之前的語文演變，與政權轉移歷史，並梳理土耳其語文在鄂圖曼帝國時期，外語混雜使用中所產生上下階層難以溝通的困境，以及其語言使用如何與宗教治理密切連結。第三節至第五節分析凱末爾語文改革之動機、規劃、實踐、受到的批評與成果評估。最後，第六節簡要總結 1920-30 年代土耳其國家語文改革成功要素之一，乃在於其為國家推動的官方改革。由學校與社會教育全面推動，不僅可在語文教育的同時，灌輸想像的共同國族意識，且經由國家機關的統一執行，改革成果斐然。

貳、改革年的土耳其語文與政權轉移

一、早期土耳其語文遷徙

土耳其較早的文字記錄可追朔至中亞現存、大約八世紀左右的石刻紀念碑（Göktürk Inscription，Göktürk 意指神聖而古老的突厥，土耳其在中古時期是突厥的一支），其記錄了 Göktürk 王朝的社會生活。石刻紀念碑文相傳為最古老的土耳其文字（Old Turkic Script, Diringer, 1948: 314-15）。Göktürk 王朝是當時中亞突厥游牧民族所建立的一支突厥汗國（Turkic Khanate，由可汗 Khan 統治），當時與中國隋、唐朝互有往來。Göktürk 來自於 Ashina 氏族，Ashina 本身的文字來自粟特語（Sogdian language）的文字。在七世紀左右，粟特語是中亞與歐洲絲路間使用的一種混同語。粟特語書寫系統源自阿拉米字母（Aramaic alphabet），是現代中東書寫系統與中亞、東亞所有非中文書寫系統的源頭，也是最古老的維吾爾文字系統。Göktürk 王朝沒落後，維吾爾人（Uyghurs，是古老突厥的一支）仍延用此文字，翻譯了大量關於薩滿（shamanism）的宗教作品（Erdal, 2004: 1-22）。

傳統土耳其語言使用深受波斯語與阿拉伯語影響，文字書寫則以波斯-

阿拉伯字母系統（Perso-Arabic script）為主。西元九世紀時，遊牧族群烏古斯突厥人（Oghuz Turks，土耳其人的祖先）居住於穆斯林（Muslim）邊區，深受穆斯林文化影響。其塞爾柱王朝（Seljuk Dynasty）就是由 Sunni 穆斯林所建立（Grousset, 2010: 148-86）。十世紀時，塞爾柱王朝遷移至波斯地區，擴大領土成為塞爾柱帝國（Seljuk Empire），建立其塞爾柱帝國行政體系，故大量吸收了波斯文化（Persian culture）。到了十一世紀下半葉，塞爾柱帝國向東發展，打敗了東羅馬帝國（Eastern Roman Empire，或拜占庭帝國 Byzantine Empire），佔領了部份羅馬帝國區域[2]，如安那托利亞（Anatolia，是銜接亞洲與歐洲大陸的高原），即現今的土耳其共和國地區。安那托利亞於是開始接受塞爾柱帝國帶來的語言文化，也就是阿拉伯語、伊斯蘭教與波斯語。

其後，塞爾柱帝國內部分裂成幾個小王朝。西元十三世紀，分裂的塞爾柱帝國中最大的羅姆蘇丹國（Sultanate of Rum，位於安那托利亞）被蒙古帝國成吉思汗（Genghis Khan, 1162-1227）的第三子窩闊台（Ö gedei Khan，元太宗，1186-1241）所發動的第二次西征所解體，而成為蒙古帝國藩屬。而此時，安那托利亞的政權也開始分裂，形成許多小王國（Grousset, 2010: 161-65）。

隨後，鄂圖曼一世（Osman Gazi ben Ertuğrul, Sultan I. Osman, 1258-1326）以酋長國制度統治了安那托利亞西部區域。1299 年，鄂圖曼一世宣布其國家獨立，也就是日後的鄂圖曼帝國；之後，帝國版圖擴張至與東羅馬帝國接鄰，定都布爾薩（Bursa）。鄂圖曼帝國在十四世紀初攻佔了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1326 年，東羅馬帝國投降，鄂圖曼帝國正式統治了現今的土耳其地區與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堡）。最巧妙的是，鄂圖曼帝國其統治者蘇丹（Sultan，伊斯蘭教的統治官職）認為鄂圖曼帝國不僅繼承了伊斯蘭文化，也承繼了東羅馬帝國文化（Imber, 2002: 1-66）。從其部落族群遷徙與帝國擴張的歷史看來，鄂圖曼帝國於現今的

[2] 現今的土耳其地區，在七世紀之前是由羅馬帝國所統治的。目前土耳其第一大城伊斯坦堡（İstanbul）則為當時東羅馬帝國的首府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土耳其地區的語言文字的確兼容波斯、阿拉伯與羅馬文化。

二、「鄂圖曼土耳其語」概念的初始

早在十三世紀初，塞爾柱學者就提出以「鄂圖曼土耳其語」為官方語的概念。直到鄂圖曼帝國出現，Sultan Orhan 酋長（1281-1361，鄂圖曼帝國第二位領導者）所撰寫的國家官方文件，就是用鄂圖曼土耳其語寫的。日後一直到十六世紀，鄂圖曼土耳其語的使用在鄂圖曼帝國成為顯學。其間，土耳其語的學習以及標準化也不斷地受到學者討論與注目（葉俊呈，2013：46）。

儘管如此，鄂圖曼帝國時期的土耳其詞彙使用，相當大部份地夾雜著外來語彙，並與本土語彙並用。其原因部份是因為除了宗教影響之外，鄂圖曼帝國入主現今土耳其地區後，漸行現代化政策。其於十四與十五世紀間，大量譯介了外來知識進入土耳其語言，許多天文、地理、醫學、植物、以及伊斯蘭文化都因而得以轉譯為土耳其語文，科學術語則主要引自阿拉伯語（Lewis, 1999: 5-26）。

十六世紀後，土耳其語言混用外來語的狀況日趨嚴重，而所謂的外來語，多指波斯與阿拉伯語。這當然一點也不令人意外，鄂圖曼帝國本身就是波斯與阿拉伯文化的混合體，不過土耳其地區（安那托利亞）本身仍有著其日常使用的「土耳其語」。長時間外來語彙的入侵，不僅僅只是詞語使用的交流與引進，還包括了上層社會、宗教社群、知識階層直接大量使用波斯語與阿拉伯語的潮流。因而儼然形成了上下兩種不同語言使用，一是以外來語為主的文學、宗教、宮廷語言（literary language）；一是普遍於民間、以溝通為主的土耳其口語（vernacular language）（Heyd, 1954: 9-10）。

值得一提的是，在主流社會受到外來語大量佔有的浪潮中，英語在十六世紀也開始與安那托利亞地區的土耳其人接觸。英語主要是使用於與大不列顛帝國的商業交易往來。雙方一開始其實都沒有學習對方語言的意願，於是聘雇翻譯員協助溝通。即使有些英國商人對學習土耳其語感到興趣，也都因為阿拉伯文字書寫過於困難，而不了了之（Dogancay-Aktuna, 1998:

26-29）。

其實，帝國統治本身並未禁止學習外語，但從文字記錄得知，土耳其人對學習波斯與阿拉伯語以外的外來語，興致並不高（Dogancay-Aktuna, 1998: 28）。可見當時對於外語的需求，並無強烈商業以及宗教以外的動機。即使到十九世紀初，對大英帝國貿易的需求以及野心，也尚未達到學習對方語言、而進一步了解商業文化的程度。例如『達達尼爾條約』（*Treaty of the Dardanelles*, 1809）簽訂時，英國外交官在土耳其境內找不到合適人選來以英文撰寫條約，最後只好以退而求其次以法文書寫（Dogancay-Aktuna, 1998: 26）。

三、帝國重整、土耳其性（Turkishness）與語言簡化

鄂圖曼帝國在奧土戰爭（Austro-Turkish War, 1716-18）與威土戰爭（Venetian-Turkish War, 1714-18）戰敗後，簽訂了『帕薩羅維茨條約』（*Treaty of Passarowitz*, 1718），帝國不僅損失了巴爾幹半島大部份領土，也暫停了西進擴張策略（Kinross, 1979: 376）。為了防範巴爾幹邊境起義以及歐洲其他國家的擴張，帝國開始了一連串商業政策改革，容許私人企業家的出現。但此舉未能獲得反叛勢力的歸營，1820 年代帝國被迫進行軍事改革，壓制叛軍。而軍事上的大大小小反動，使得帝國反思中央權力是否不再能有效控制地方，於是 1839 年起進行「帝國重組」運動（Tanzimât, 1839-76）。

帝國重組的意義在於建立起共同的「鄂圖曼主義」意識，來抑制境內其他民族主義風潮的形成。藉由提倡現代化、包容境內多元文化、以及公民自由平等的策略，企圖將境內非土耳其人與土耳其人整合起來，成為鄂圖曼公民（Ottoman citizens）。

鄂圖曼在其現代化過程中，不斷地引進與轉譯西方知識與科技，如：發展大眾運輸、鐵路、電信、郵局、大學、科學研究院，建立國家衛生健康與現代城市規劃部門（Deringil, 1993: 3-29）。在建立鄂圖曼現代化的同時，也型塑鄂圖曼主義，國旗與國歌也在此時提出。

然而，鄂圖曼領土暴露在外語翻譯的現代化中，外語詞彙席捲本土語彙的情況令語言學者擔憂。在 1830 年代後的帝國重組改革時期，此現象就

被提出警告，但未有所改善。其主要是因為政策面未能配合，帝國在此時期一方面致力於改革與接受現代化，一方面全心建立帝國新氣象、新子民。

在語言文字改革提議上，僅有知識份子語言簡化理論（simplification in language）的提出，並無政府全面響應支持（Heyd, 1954: 9-18）。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兼容非土耳其人成為帝國子民的改革中，若試圖簡化語言中的外來語彙（如波斯與阿拉伯語），很可能造成境內後兩者語言使用族群的不滿。在鄂圖曼國家主義意識型態未能完全植根於民間之前，帝國政策漠視簡化語言的建議，尚可理解。

十九世紀中後期，多數提出語文改革簡化理論的學者都是譯者與文字工作者，且多持有濃厚而強烈的「土耳其主義」色彩的言論。他們所型塑的民族主義是「土耳其」的，而非「鄂圖曼」帝國的。這批學者對日後二十世紀凱末爾的語文改革有相當大的影響，他們有些是所謂的「鄂圖曼青年」（Young Ottomans）。鄂圖曼青年是由一群由鄂圖曼土耳其知識份子所建立的社團，他們多不贊同帝國重組的內容，而認為應當保有鄂圖曼傳統，並兼顧帝國現代化；即使是現代化，也應遵循歐洲的路徑，建立憲政體制政府，並保持伊斯蘭身為鄂圖曼帝國重點文化的正當性（Akgündüz & Ö ztürk, 2011: 318）。也就是說，鄂圖曼青年在帝國「現代化」vs.「傳統保持」之間，以及在「鄂圖曼」vs.「土耳其」的自我身份認同之間，選擇性地追求身為「土耳其」人所承繼的「鄂圖曼」傳統，並在西方國家現代化的成功案例中，挑選可接受的效法途徑。

在鄂圖曼帝國重組的規劃中，帝國政府有意讓「宗教多元性」合理化，並鼓勵非土耳其或是非穆斯林的族群向帝國靠攏，於是通過法案，增強了亞美尼亞人族群（Armenians）在帝國內自治的權力，廢除其貴族統治，其米勒（Millet）也因此得到更廣泛的自治權。米勒制（Millet System）長期以來存在於土耳其社會管理制度中。原先是以宗教信仰為核心的自治團體，擁有自己的法庭與教育管理體系，類似少數族群自治的概念。米勒雖然是以宗教信仰來規範米勒社群，對每一個米勒族群而言，他們是帝國內一個個單獨的群體，帝國甚少干預。但是，在重組期間內，亞美尼亞人族群的米勒法案通過，其實象徵了帝國間接地同意讓米勒由「宗教」轉向「族群」

治理，一方面消弱米勒制本身對教徒在教育與法律上獨佔性的控制，一方面降低宗教領袖的權力（葉俊呈，2013：38-43）。由於米勒在伊斯蘭世界是治理非穆斯林族群的制度，所以在帝國重整時期內，亞美尼亞米勒法案的通過象徵對伊斯蘭宗教界的反動，對堅持保有伊斯蘭正當性的鄂圖曼青年而言，當然是感到不滿的。

這群鄂圖曼青年中，有些是語言學家，他們提倡鄂圖曼傳統應該保留，但其語言應簡化。改革學者中，Mehmed Ziya Gökalp（1876-1924）和 Sami Frashëri（1850-1904）屬於較特殊的例子，並對二十世紀的語文改革產生深遠影響。Mehmed Ziya Gökalp 不僅是土耳其社會學家與作家，也是政治激進者。之後凱末爾的改革從其想法上得到很大的啟發。Gökalp 的影響，主要在於其對於土耳其主義的概念。他認為土耳其文化與語言，應該要深入推廣到鄂圖曼帝國的每個角落，並鼓勵帝國子民成為「土耳其人」。他所要發展的土耳其人認同是：擁有一個共同的「國家意識」，才能成為真正的土耳其人（Moaddel, 2005: 17 ）。其大作《土耳其主義之概念》（*The Principles of Turkism*, 1923）指出：一個國家應是由一群有「共同語言與宗教」的個體組成，而非以族群為組成要素（Gökalp, 1968）。他所提出的其實是個泛土耳其（Pan-Turkish）概念。他理論中的「土耳其人」定義上溯至土耳其人共同的祖先烏古斯突厥人，甚或更早期，那些使用土耳其口語的民族。這與凱末爾日後改革中的「太陽語言理論」（Sun-Language Theory）甚有異曲同工之趣。

Sami Frashëri 是個語言學家、詞典編撰者、小說家。1868 年 Frashëri 被送到 Zossimea（位於 Ioánnina，在安那托利亞北邊）學習希臘語，同時，他還自學了波斯與阿拉伯語。後來，他搬回了伊斯坦堡，並為帝國的國家新聞處工作。在帝國重組時期內，他使用土耳其語寫作，並編了《土耳其字彙》（*Turkish Lexicon*, 1900）一書，成為後世學習鄂圖曼時期土耳其語的重要參考書。其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則是提出語言簡化概念，他認為在土耳其現代化過程中，語言簡化是必要的，帝國也應發展土耳其口語以及其文學形式（Trencsenyi & Kopecek, 2006: 297-98）。

四、憲法保護下的鄂圖曼土耳其語與伊斯蘭國教

1876 年 12 月，一群受歐洲教育的鄂圖曼青年推舉的第一部鄂圖曼憲法（Ottoman Constitution），由鄂圖曼帝國第三十四位蘇丹 Abdul Hamid II（1842-1918）頒布。鄂圖曼青年的歐洲學習經驗與觀察，使其認為憲法體制值得借鏡。除此之外，他們也認為蘇丹的權力過於專制與獨裁，只有憲法能夠保障土耳其人應有的自由，而基於憲法，人民仍是應服從法律與蘇丹的領導。此憲法是由 Krikor Odian 起草（1834-87），他的學生 Midhat Pasha（1822-83）撰寫。其中，第十一條聲明了「伊斯蘭為國教」，帝國同時也會保護信仰自由（free exercise of faiths）。在憲法多處，也明確指出：鄂圖曼土耳其語是「官方語言」，任何從事公職的人員都應使用土耳其語。任何不會讀寫土耳其語的公職人員，不得參與議會政治（Islam Heritage Project, n.d.; 葉俊呈，2013：51）。

換言之，帝國統治與宗教信仰仍是密切相連的共同體，而一個國家所應有的統一語言則是土耳其語。所有官方文件書寫與討論也都應使用土耳其語文。以土耳其人為主的國家民族意識，正式在律法生根。而此時，所謂的土耳其文，其實也是以阿拉伯文字書寫的土耳其話。因為傳統的伊斯蘭文化所培養的信念是，只有經由阿拉伯文符號，才能真正貼近真神阿拉所訓示的道理。既然伊斯蘭為國教，那麼使用阿拉伯文字則是必然的。不過，當時官方與上層社會知識份子所使用的土耳其語言，並非等同於日常口語或是目前使用的土耳其話，而是一種近似於古老書寫語言的依斯提拉對話（istillâhî konuşma，是一種高度混合波斯、阿拉伯語彙的語言，是當時一般民眾所無法理解的）（Lewis, 1999: 10）。至於為何上層社會使用非民間語彙，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可以想像的是，其如同中國文言文與白話文的差異般，對於文言文的理解，若是未經特殊學習過程，一般中國人對中國文字的基礎知識與使用，其實是不足以完全理解文言文的。同理得知，一般土耳其人也須經由學習，才能讀懂上層社會的書寫語。

五、從帝國走向共和

鄂圖曼帝國在 1877-1878 俄土戰爭（Russo-Turkish Wars）戰敗後，便解散了國會。再度恢復集權專制統治。一直到 1908 年，受到鄂圖曼青年啟發的一群人，組成了政治改革組織「土耳其青年」（Young Turks），發動青年土耳其革命（Young Turk Revolution），反抗獨裁政體。在革命的壓力之下，蘇丹 Abdul Hamid II（1842-1918）才重新開啟國會（Quataert, 1979: 22-29）。

十九世紀的下半葉，鄂圖曼帝國基本上是處於民族與國家主義氛圍下的獨立分裂中。原先帝國統治下的塞爾維亞、羅馬尼亞、蒙特內哥羅、及保加利亞在俄土戰爭後紛紛宣布獨立。突尼西亞則在 1881 年被法國佔領。大英帝國（British Empire）此時扮演同盟協助者的角色，在 1882 年幫忙鄂圖曼帝國，重新奪回在塞普勒斯的統治權，並進而派兵進入埃及（Egypt，北非），協助鄂圖曼帝國平定埃及叛變（Urabi Revolution）（Cole, 1992: 234-72）。

鄂圖曼帝國在 1908 年再度進行軍事改革，隔年成立空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戰事不斷。帝國境內子民隨著領土的縮小漸漸移住安那托利亞地區。1912-13 間兩次的巴爾幹戰爭（Balkan Wars）使得鄂圖曼帝國損失了大量歐洲領土，並造成了塞爾維亞與奧匈帝國的間隙（Chatterji, 1973: 111-27）。在巴爾幹半島上，同盟與對立的關係瞬息萬變。第一次巴爾幹戰爭後，鄂圖曼帝國敗戰同盟的塞爾維亞、保加利亞、與希臘。因而割讓了巴爾幹半島大部份土地。然而，在第二次巴爾幹戰爭中，塞爾維亞、希臘與鄂圖曼帝國同盟，打敗了保加利亞。在當時，奧匈帝國已是世界強國，覬覦巴爾幹半島領土，於普奧戰爭（Austro-Prussian War, 1866）後佔領了巴爾幹半島上的波士尼亞（Bosnia）。因此，第二次巴爾幹戰爭後，奧匈帝國與塞爾維亞成為半島上兩大政治與軍事勢力。塞爾維亞在 1878 獲得柏林會議（Congress of Berlin）的認可後，1882 年成立了獨立王國（Kingdom of Serbia）（Hertslet, 1981: 2759-98）。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就是起因於仇奧的塞爾維亞人刺殺奧匈帝國

皇太子，隨後奧國認為塞國無心解決問題，因此在 1914 向其宣戰。鄂圖曼帝國此時加入同盟奧匈帝國陣營，與其他列強一起攻打塞爾維亞。這其實一點也不意外。塞爾維亞從十五世紀至十九世紀一直皆是由鄂圖曼帝國統治的。由於俄國有意抑制鄂圖曼帝國在歐、亞、非三洲版圖擴張，因此協助塞爾維亞在 1882 年獨立。之後，帝國本身仍是傾向將塞國收回的。不過，在第一次大戰中，雖然有德國的協助，鄂圖曼最後仍然告敗。

1919 年巴黎和會（Paris Peace Conference）中，雙方處理第一次大戰同盟與協約國的勝敗結果。鄂圖曼帝國於 1920 年被迫與協約國簽訂了『色佛爾條約』（*Treaty of Sèvres*），由於不滿條約中對土耳其的不公平條款（如割地希臘、戰爭賠償、以及將所屬阿拉伯地區土地割讓英、法國），凱末爾阿塔圖爾克起而領導帝國境內土耳其人否決色佛爾條約，並向希臘、英、法國發動了土耳其獨立戰爭（Turkish War of Independence, 1919-23）。

鄂圖曼帝國自此從國際政治舞台上消失（Helmreich, 1974: 320）。1923 年，土耳其戰勝，宣佈成立土耳其共和國，與協約國簽訂『洛桑條約』（*Treaty of Lausanne*），並以此取代了先前的色佛爾條約，確定了現代土耳其的領土，放棄阿拉伯地區的土地，收回色雷斯（Thrace，部份的希臘與保加利亞地區），定都安卡拉（Ankara），凱末爾成為土耳其共和國國父（Axiarlis, 2014: 11）。

鄂圖曼帝國改革以及其十九、二十世紀涉及的歐、亞、非政治版圖戰爭，與凱末爾在 1920 年代進行的語文改革淵源關係深遠，因為這關係著土耳其共和國的語文改革動機（尤其是與過去政治與宗教勢力劃界）、語言選擇、語言規劃實踐、與其改革成效評估。

Shohamy（2006: 54）[3] 的語言政策架構可提供我們清楚的分析概念。其將語言政策簡要劃分為語言實踐（language practice）、語言意識形態（language ideology）、語言機制（language mechanisms）（如圖 1）。這其中語言機制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其不僅控制語言實踐，也同時左右語言

3 Shohamy（2006: 52）的概念主要延伸自 Spolsky（2004）的語言政策理論，包括：語言實踐（language practice）、語言信念（language beliefs）和語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

意識形態。除此之外，語言選擇與規劃也皆出自其手。在本文中，此機制指的是國家機關以及其授權的語言政策與標準制定單位，掌管實際語言政策的決行。Shohamy 指出，機制可指涉任何公開或隱蔽不顯的設置（devices），只要他們都具有影響實際政策施行的能力。本文僅討論公開的機制，如語言學會以及國家語言教育部門，他們皆背負著國家主義與認同教育的重責大任。語言意識形態，在前面章節討論的政權轉換中，也很明顯地表現在塑造不同的民族性上面，如鄂圖曼土耳其。因此，意識形態與機制，相互影響、彼此左右。學校與社會教育團體、媒體、教材與教師則扮演著生活上實踐語言政策的環境與組成。他們是機制的真正幫手，是真正的推廣者，當然他們的教學成果與評估以及受到的批評，也可能直接或間接修改機制（一種由下而上的）。本文參考 Shohamy 的架構，主要集中討論機制，也就是凱末爾所帶領的改革團隊，如何透過語言學會與語言法令來傳達土耳其新政的意識形態。也就是說，藉由法典化與規範化語文使用，新政府表達其對進行現代化與政教分離的堅定意念。語言學會所執行的工作看似編撰字典與收集語料，實際上是肩負語言淨化的要職，他們將抽象的政教分離概念具體化為詞彙篩選的任務，並提出學術理論（如太陽語言理論），企圖改向世界學術研究方法，驅使土耳其學者扮演將其國家意識形態落實於全球的角色。印刷資本在此環環相扣的語言政策鏈中，是機制的一環，也是實踐的一部分。

圖 1：Shohamy（2006：54）語言架構：意識形態、機制與實踐

參、凱末爾語文改革

凱末爾建國後，實踐其受到十九世紀語文改革家的影響，著力發展土耳其共同的國家意識與統一的語言文字[4]。其改革動機主要是要建立純土耳其人的語言與認同（pure Turkish and Turkish identity）；實踐方式則是透過去除傳統鄂圖曼土耳其文化中波斯與阿拉伯語言文化與政治的影響，使新政與伊斯蘭教政教分離、世俗化伊斯蘭教的掌控與政治管理，最後帶領土耳其新民走向現代化（Eastman, 1983: 221）。

語言與文字改革必須配合政治與社會改革。1910 年代的土耳其正是處於一個急需政治改革、社會整體恰可配合的時機[5]。也就是說，其時，土耳其社會已經蘊釀改革一段時間了，除了延續十九世紀簡化語言的脈絡，前面提到這批推動恢復憲法的土耳其青年也是主力之一，他們許多是政治作家，筆尖與思考極富批判性。在共和國成立前已有作家提出要求，進行以城市中受教育土耳其人口語為基準的語文改革，不過因未得到鄂圖曼帝國政府的支持，而無疾而終（Eastman, 1983: 222）。

凱末爾除了受到十九世紀鄂圖曼思想與語言革命家的影響外，其本身接受過軍事教育，在馬其頓的莫納斯提爾（Monastir）軍事學校畢業後，曾在不同地方擔任官職，並參與國家主義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同盟國打到了安那托利亞，他便辭掉工作，組織軍隊，攻打同盟國敵軍。1923 年獨立戰爭勝利，新土耳其國會成立後，凱末爾成為首位土耳其共和國總統。

其就任後，首要任務當然是運用其身為元首的政治力量，進行各式官方改革，語文改革即是其中之一。凱末爾在 1925 年發表了重要演說，為革命下定義（Spearman & Turfan, 1979，斜體為筆者所加）：

---

4 凱末爾主義包括六個原則：共和、世俗、平民、民族、改革、國家。此六原則於 1937 年編入憲法中（耆濤，2011：334）。

5 Eastman 認為土耳其改革的契機，恰逢十九世紀當時已有一批受外語教育的土耳其大使，感受到語言使用廣泛程度的重要性，剛好有一批青年土耳其也認可這樣的改革，再加上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軍事上，對語言使用的需求，於是改革成為必要（Eastman, 1983）。

> What is the Turkish revolution? This revolution signifies a transformation far broader than the word revolution suggests…It means replacing an age-old political writing based on religion with one based on another tie, that of *nationality*. This nation has now accepted the principle that the only means of survival for na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struggle for existence lies in the acceptance of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從其定義看來，其所謂的「革命」，強調新的國家書寫系統是一種完全取代舊式以宗教為主體的書寫，是一種國家的文字系統。土耳其語文改革，將以另一種形式來連繫土耳其人，也就是「民族性」（nationality）。雖然，當時某些學者認為新政府其實是自 1908 以來，得勢的一群土耳其青年精英，這樣的新政談不上是革命，只是過去鄂圖曼帝國反抗勢力的延續。不過，從其定義看來，凱末爾認為國家已經形成，而革命是必然，且應是一種國家主義式的全面性推動。推動方式即是去除過去傳統中，以政教為主體的書寫形式以及語言表達，並以新國家執政所需要高度仰賴的現代文明來取代傳統。

一、舊語文的缺點與現代化改革

對凱末爾新政而言，普及讀寫（literacy）是吸取文明的重要手段，而當時識字率過低，所以需要進行文字改革。藉由文字改革來汲取文明的想法，與鄂圖曼青年的背景有關。無論是鄂圖曼青年，或是土耳其青年，都是一群受西方教育的土耳其知識份子。由於見識西方國會制的成功，於是積極建議鄂圖曼帝國應仿傚西方政治現代化。而在複製西方現代化的成功與價值上，首要任務即是引進西方教育理念與知識，才能跟隨其成功路徑，文字上的改革則是能夠讓改革在教育體制更有效率地進行。西方化（Westernization）、現代文明（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與現代化成為同義複詞，都是讓土耳其從過去宗教傳統書寫走出來、邁向現代的指標。

此處，我們得強調，傳統土耳其語言文字使用上的不便與不一致，阻礙了知識的取得。這問題在建國之前，早已被提出改進。在凱末爾改革之前，土耳其語言夾雜了土耳其日常口語、波斯、與阿拉伯語，而文字則是

阿拉伯文。這三種語言其實分屬不同的語源系統，阿拉伯語是閃語系（Semitic languages）、波斯語屬印歐語系（Indo-European language）、而土耳其語則屬於烏拉爾-阿爾泰語系（Ural-Altaic languages）（Wright, 2004: 52）。但這些語言混雜在土耳其人之間使用，並且以阿拉伯文書寫。由於語系相差甚遠，阿拉伯文並不完全適合書寫土耳其語，例如：阿語只有三個母音，但土語則有八個。

凱末爾政府推行的現代土耳其語言文字，是以土耳其民間使用的土耳其語為主要語料標準，文字是由 29 個羅馬字組成的系統，不過刪去了 q、x、w，因為其在土耳其語中不適用（Heyd, 1954; Wood, 1929: 198）。凱末爾在一次的演講中提到（Wortham, 1930: 188-89）：

> As long as Turkish was written from right to left, it could never properly express the ideal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The picturesque involutions and intricacies of Arabic script afforded a psychological background to the Oriental mentality which stood as the real enemy of the Republic.

此處，凱末爾很明確比較了學習西方與其東方主義的心態。他認為土耳其若是繼續以阿拉伯文書寫，則永遠無法脫離東方心態，也無法以文字表現歐洲文明。也就是說，土耳其的改革，是要走向西方文明發展的羅馬字書寫，東方書寫（由右而左）是與改革相悖，並且阻礙文明發展的。其言論中帶有強烈的「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Carrier, 1995; Buruma, 2004），一種東方世界對西方的想像，以及自我矮化的迷思，認為西方文明的成功來自其文化以及知識的普及，進而造就強盛的國家。西方主義的眼光在想像西方文明的過程中，已將文明階層化，在如此心態之下，東西方在相互審視之餘，很難站在對等的位置上對話。

這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也曾發生。西方世界的船堅炮利，在鴉片戰爭後，給予中國人強烈且鮮明的印象：認為西方的科學與民主可以拯救中國落後的靈魂。在文化交遇之處，「全盤西化」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各自表態。中國與土耳其在學習西方的心態極其類似，兩者皆在檢討自我的同時，感受文字上帶來的不便，而導致知識無法普及，而這些都要歸咎中文以及阿拉伯文學習的困難。教育是執政體制的一環，只要政策

能夠全面配合，如：強制性的義務教育，知識普及在任何文字中都做得到。但學習西方的心態，在二十世紀初的國家主義與國家強盛的目標下，甚為複雜。以土耳其為例，其涉及的並非只是知識取得的問題，背後有著更強大的政治計畫與權力劃分考量，政教分離即是其一，讓凱末爾決心以文字語言的方式，與過去傳統的伊斯蘭世界切分。

二、1920-30 年代的制度改革：政教分離與法典化的語文

凱末爾深知大規模的語文改革必須由國家統一、由上往下執行，若是缺乏政治或是社會力量有力的推動，語文改革很難往前走。因此在 1923 年，當凱末爾尚未完全確立政權之前、政治勢力尚未完成明朗化時，其在一個經濟會議上被問及是否支持土耳其文字羅馬字化一事，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原因則是時機未到。而時機則是凱末爾政府當時尚未能掌握在野對其改革完全的支持，以及國家剛成立之際，行政體系尚未能全面掌控（Lewis, 1999: 37）。

1924 年，凱末爾開始有了改革的大動作。3 月國會通過法案（*Unification of Education Law*）廢除米勒與穆斯林領導人制度（caliphate），並解散舊有的鄂圖曼王室。法案同時也廢除所有的宗教學校，規定所有的私立學校都得納入教育部的規範之下。在此之前，鄂圖曼帝國的教育體系是受到宗教單位管理的（例如：米勒），也就是說政治與宗教領域是重疊的。

新的法案主張政教分離（Çolak, 2004: 68）。1928 年國會刪除憲法中伊斯蘭為國教的條文，給予人民更多宗教選擇的自由（葉俊呈，2013：88）。將政教分離政策法律化的好處是，學校老師與學生有義務學習國家制定的標準語言與文字，無論其喜不喜歡，或是接不接受，因為這是義務教育的一部份。而公職機構、考試、審核、以及公領域的語文傳遞，皆成為官方語言文字展示的舞台。實行政教分離主要原因，一則是過去由宗教來管理的教育體制，著重於各宗教系統獨立的教義與傳統，無法形成統一的國家主義意識。政府收回教育管理權，才能有效率地以法律形式，強制執行以國家意識為優先的改革與政策推廣。二則可順勢以政治與法律為工具，打擊過去因伊斯蘭宗教，掌權得勢的一群舊政治勢力。也就是說，藉由取消

宗教學校、將宗教科系學院移出一般大學教育，使其自成宗教研究體系，在邊緣化宗教研究學者以及重新劃分教育資源的過程中，不但可實現政治歸政治、宗教歸宗教的理念，也透過如此資源重整的實踐，改變土耳其人對傳統伊斯蘭社經地位的想法，並同時改變土耳其社會結構。

國會在 1928 年 11 月通過羅馬字方案，經由國家法典，全面統一書寫系統（*Law on the Adop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New Turkish Letters*）。法案中規定，所有舊式阿拉伯文書寫都將被禁止。從 1929 年 1 月開始，由凱末爾所領導的委員會規劃與執行，全國在公領域都必須使用羅馬字書寫土耳其語（葉俊呈，2013：78）。1929 年 6 月開始，個人與公部門的書信往來，也都必須使用羅馬字（Lewis, 1999: 37-38）。當年，語言委員會開會討論語言規劃與執行時間時，凱末爾認為三個月應能將羅馬字完全推行至民間，雖然委員們對快速改革略有微詞，仍在六個月內完成羅馬字標準化，並立即透過印刷媒介，使全國報紙開始使用羅馬字傳遞每日訊息。凱末爾政府標準化了語文，就是為了確保新土耳其語言以及羅馬字成為土耳其人共同、並唯一的一套語文標準（Eastman, 1983: 225）。

三、語言選擇

凱末爾政府以國家主導的語文改革，從其語言政策、選擇、規劃、執行面來看，主要表達兩大目的：第一是以羅馬字普及教育，減低文盲率，並由國家教育管道建立土耳其的現代化文明，故需強化語言規劃與語言選擇；第二是建立土耳其（以安那托利亞地區為主）的國家意識與認同，去除地方性（regionalization）與宗教自主所帶來國家統一意識上的分化，並正當化凱末爾政權的領導權力。兩者息息相關，後者與其日後支持語言淨化政策、成立語言學會、並聲援學會的太陽語言理論有關。

由國家提倡的語言與文字統一政策，常與國家現代化有關。Fishman 歸納近代國家主義（nationalism）的三種特徵，包括：統一、獨特（authentication）[6]、及現代化（Fishman, 1971: 4）。國家民族主義的發展

6 Fishman 此處對 authentication 的解釋為「Nationalism is uniqueness-oriented. The avowed

必須伴隨國家體制在不同形式上的一致，例如：政體和語言。而隨著在法律面上一致性的建立，國家政權得以被確認為真實且唯一（uniqueness）的政體，並賦予符號權力（symbolic power）（Bourdieu, 1991）。土耳其現代化的過程與建立，可藉由推廣與普及化國家語言及其特性來完成。

國家語言（national language）的選擇，在現代化過程中顯然是很重要的。Fasold 的四項國家語言選取原則很值得我們參考。他認為選擇國家語言主要有四項動機：對某群體的認同、與某群體保持距離、廣泛地參與發展、以及語言學上的考量（Fasold, 1984: 248）。其實這四者環環相扣，也並非相互抵觸。當對某群體表達認同的同時，其實，也是對其他群體劃了界限；而表達認同的動機，也無獨有偶地常與參與發展有關，比如：現代化。最後語言學上的考量，則是讓國家語言制定最佳化的途徑。以土耳其改革為例，雖然有些學者傾向劃分凱末爾的語文改革，是為了廣泛地參與土耳其世界的現代化發展，進而弱化與伊斯蘭世界的連結（Unseth, 2005: 19-42）。本文建議在考量 1920 年代土耳其語文改革動機上，應將 Fasold 的四項動機均加以考慮，才有助於釐清改革前後的歷史與國家主義發展的上下脈絡。

從法律制度面上，將土耳其口語以及羅馬字書寫官方化的舉動，所遵循的是將過去通俗傳統進階為經典傳統的做法。Fishman 將國家採用語言的類型區分為三種，一是由於欠缺大而經典的傳統（great traditions），國家獨立後的官方語，延續了前代/朝的語言；二是使用其經典傳統的語言；三則是在多元經典傳統中，協調出一種多元模式的官方語言（Fishman, 1969: 111-35）。

如果我們將過去的波斯、阿拉伯語、土耳其語的混同及書寫，定義為土耳其經典的傳統語言（考量其主要用來書寫文學與宗教語言，並在上層與主流社會間流通），現代土耳其語言以及新文字系統所表現出來的，則

---

rationale for the unification of hitherto particularistic and diverse subgroups and the manifest dynamism both for the unificatory as well as for the purposive goals of nationalism are the ethnic uniqueness and cultural greatness of the nationality. This uniqueness, it is claimed, was, in the past, responsible for glorious attainments…」，故譯為獨特。

是超越經典傳統，但同時又保有傳統，是一種將微觀傳統提升至宏觀層面的舉動。過去改革前的時代，土耳其口語於民間流傳使用，同時與波斯與阿拉伯語兼併成一種混合語，並於精英與宗教社群中使用。在改革前之所以演變為上下無法溝通的狀況，是因為上層社會的語言使用中，外來語成份過多，影響了土耳其語本身的表達。稱其微觀是因在文字書寫歷史上，土耳其語在改革前並未能霸佔主流文化，而以口語型式流傳。其民間文學甚至在外國語彙大量侵入的時代受到嚴重波及，而與精緻文學合流，並使用波斯—阿拉伯語彙。這也是凱末爾改革日後推行語言淨化的主因，其強調真正的土耳其語，應該將外來詞彙逐出國門，並使用在民間流行的、真正的土耳其語言。

肆、語言改革規劃與實踐

一、羅馬字書寫

凱末爾改革訂立了一套由公部門開始、親身力行的語言規劃與實踐。他不僅倡導羅馬字教育，也下鄉親自教學（Spearman & Turfan, 1979: 91；葉俊呈，2013：76）。對於過去使用阿拉伯文的知識份子而言，羅馬字顯得容易許多，雖然短期間內他們成為羅馬字文盲，但因為羅馬字簡而易學，其本身原本就會說土耳其語，所以很快地就能夠閱讀報紙；而對土耳其文盲（pure illiterate，未受任何文字教育者）來說，羅馬字化的書寫，相較於阿拉伯文，則更容易上手，學習時間因而縮短，因而創造出許多平民書寫群體（Spearman & Turfan, 1979: 90-97）。

羅馬字化在建立文明與西方化上的抽象意義常被忽略。在去除文盲的實質功能上，羅馬字的確相當有效率地增進識字率。凱末爾改革的基本精神就是國家與民族的建立，必須立基於現代文明之上；若是人民不識字，文明便無從理解。也只有增加識字率，人民才能閱讀，並進一步與其他文明或是西方化接軌。經由科技與科學知識的翻譯，具體的西方現代性才能被轉譯，這也給予文字改革者重要的藉口，羅馬字象徵對西方現代化的汲

取。若是打算全面接受西方文明，那麼模仿其書寫與閱讀形式是必要的（Çolak, 2004: 71）。

我們不難發現在 1910 年代末期，全球一片民族自決與族群獨立的聲響中，許多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獨立。獨立的自由思潮，即使不是具體的政權轉換，也間接地傳入各國知識份子耳中。接著 1920 與 1930 年代，羅馬字化的提議在數個國家中漫延開來，舉凡土耳其、中國、蘇聯、越南、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日本本島、以及韓國都籠罩在羅馬字化的雲霧中（汪宏倫，2004：123-76）。這一波全球性的羅馬字化運動（globalized romanization），不乏急切想要減少文盲的、也不乏盼望受到現代化或西方化眷顧的。 他們有的看到了別人家的語文改革成功，期待自家也能效法；也有的思索原先的文字，是否造成文盲率居高不下之因，並希望藉由羅馬字化（或拉丁字化）去除落後，走向富強與現代化（Kosmarskii, 2007: 69-70；張學謙，2014：18；Marr, 1981: 138）。

不過，凱末爾引導的舉國上下文字運動所要改變的，並非僅僅只是改善識字率。其主要還是形塑一個專屬土耳其人的現代化國家。這現代化的願景，不僅藉由媒體與演講，不斷地教育人民與過去傳統切分（也就是與伊斯蘭）與邁向現代化的好處，也企圖將過去多語或混合語使用的時代轉變為單一語言的時代。這樣的單一語言與書寫是土耳其的，並只在安那托利亞地區存在。如此的民族認同形塑，才能驅使原先已有文字學習基礎的土耳其精英學習土耳其國家文字。知識份子對於語言文字使用，是相當有意識與敏感的，尤其是作家。說服知識菁英改變語言溝通方式，除了公共體制的強制性轉換之外，如何令其願意學習與使用新文字，動機的給予與提供極其重要。愛國主義思想肩負了說服知識份子的重要任務（葉俊呈，2013：67、75）。

也就是說，統一的語言規劃與推廣首從國家教育系統出發，打破過去精英語言與平民語言的藩籬。這不僅達成凱末爾改革中教育平民化的目標，也使其改革可以落實至每個角落，並且確保是所有土耳其人都能理解的。知識權力不再只是某些群體的獨門絕學，每個土耳其子民，從今爾後，都可以享有因知識帶來生活上的便利與新生活。除此之外，國家語文教育可

創造一種大眾式的、嶄新的土耳其國家民族認同、賦予人民民族使命感，強調一個共同的、並獨特的新語文對新國家建立的重要性。

二、印刷資本主義、國族想像與國家語言推廣

在探討 1920 年代土耳其語言規劃與推廣的議題上，多數人忽略了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的重要性。在抽象層面上，印刷提供了共同的、不共時的閱讀介面，統一的、形象化的訴求新政體如何生產與再生產知識（包括國家意識與西方現代化的引進）。利用統一的語言與文字，國家得以塑造其製造的「想像的共同體」。

印刷資本對資訊流通所提供的共同的、但不同時的介面，並非只在國內瀰漫。如果是應用於國際性的重要外交與商業訊息傳遞上，共同的拼寫文字不僅可降低因文字溝通所造成的時間延宕，還可使訊息更精確地相互傳達。1855-1928 年鄂圖曼帝國的外交電報中，一直延續使用拉丁字的摩斯電碼，即使在帝國仍強調阿拉伯文為重的時期，對外的訊息溝通介面，礙於機器與阿拉伯文打字的不便，拉丁文仍是首選（葉俊呈，2013：54）。

這訊息的背後，其實透露了重要的語文危機。也就是說，相較於羅馬字，阿拉伯文是不方便於印刷物中使用的。在 1862 年鄂圖曼帝國的教育部長 Maarif Nazırlığı 所發表的演說中，不僅針對阿拉伯文造成學習的困難加以批評，也指出阿文在印刷上的困難度遠高於拉丁字。他強調大部分國家只需要 30-40 個字母活字雕版，但阿文光一個字母就需要 2-3 種或是更多的雕版，這造成了印刷成本的提高，也讓知識普及更加緩慢（葉俊呈，2013：54-55）。簡而言之，阿拉伯文不適合在活版印刷讀物中，進行普及知識的工作。

在改革的具體執行面上，1928 年後，全國的報紙與雜誌、學校教科書，都漸改為羅馬字拼寫的土耳其語，並禁止波斯與阿拉伯語公開書寫於非宗教儀式中（葉俊呈，2013：85-90），也漸漸禁止公開教授阿拉伯語（Gallagher, 1971: 164-65）。公家機關的往來文件、出版品、國家圖書、公共場所中的各式標示與表格全都強制性地改為土耳其語的羅馬字書寫。宗教書籍也開始編寫以土耳其語讀寫的可蘭經章句。凱末爾的語文改革視覺性的全面侵

入市民的生活，促使各大印刷商與圖文業者跟進。《民族報》、《共和報》、《晚報》、《時報》、《圖文報》、《民族主權報》皆相繼在版面上刊登土耳其語文教學（葉俊呈，2013：75-76）。

應用印刷媒介，在學校教育外進行市民社會教育，所呈現的是語文改革在轉換之際的有趣現象。一般而言，報章雜誌的讀者大部分是識字階層，文盲少有閱讀習慣。這與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在《三六九小報》以及《南音》上的臺灣話教學有異曲同工之妙。印刷文化與知識份子的生活，不僅切身，也相互影響。藉由印刷讀物汲取資訊，是知識份子特有的進修管道。如果當時舉目所見，皆為新式書寫，讀者其實是被籠罩在全面式的視覺學習中，突顯了印刷資本與語文改革的緊密關聯性。

再者，何種知識是當時凱末爾改革所強力推舉學習的？西方現代化。大部分的西方文明叢書皆是以羅馬字書寫，使用羅馬字當然被視為是最便利的方式。雖然鄂圖曼時期也曾大量轉譯波斯與阿拉伯語科普書籍，對於 1920 年代急欲與過去切分的新政府來說，如果學習現代文明是訓練土耳其公民的策略，跳過波斯與阿拉伯，直接由西方母體吸取現代化的養分是更正當，並有利於新共和政府的羅馬字推廣。

如前所言，1920 年代全世界所興起羅馬字化的語文改革風潮，看似是民族主義國家用來降低文盲並跟進西方世界成功的路徑;從另一方向檢視，羅馬字印刷書寫所象徵的進步、現代、與西方，以一種全球性的印刷流通方式，不斷地向非羅馬字使用群體擴張。在渴望知識、活字印刷普及的時代，拉丁文讀物乘著印刷資訊快速、便利、成本低的順風車，駛向了東方非拉丁文的世界。

凱末爾政府的語言策略，實踐了 Benedict Anderson 不斷強調的知識生產（對文盲、普羅百姓、或是知識精英）與國家想像的關係。Anderson 在論及印刷語言的重要性時，有一段精闢的申論。他提到印刷語言的選擇，與十九世紀那些發展來強化國家主義的語言政策不相同。過去的行政語言（指精緻的書面語），只是一種官僚系統發展出來方便他們自己的語言，與民間使用的各式白話書寫不同。新的想像的共同體的出現是種半偶然的、與知識生產系統與生產關係間的（資本）、訊息科技的（印刷）、以及人

類語言多元化宿命的互動。他再三強調語言多元性的宿命是種普遍、無法改變的狀況。重要的是此宿命、印刷科技、與資本如何相互作用。其主張印刷語言在國家意識製造過程中，扮演了三個不同、且同等重要的角色。第一，是創造了統一共同交換訊息的場域；第二，是賦予語言固定性，也就是說，印刷書籍是種永久性的格式，但容許不同時間下知識的再生產與詮釋；第三，印刷資本主義開創了一種不同於舊式行政官僚體系的語言權力關係。他指出如此新的語言與權力關係，從土耳其地區、伊朗、伊拉克等地中的土耳其語言使用群體中可看出（Anderson, 2006: 42-45）。語文改革後，過去以土耳其語、波斯、阿拉伯語文所組合的整體性已經失去，凱末爾以與伊斯蘭切割為代價，來建立土耳其式的國家意識，強制執行羅馬字義務教育。

雖然 Anderson 的理論意味著土耳其改革利用印刷資本來宣傳國家意識，並建立共同的書面形式，讓全國上下得以溝通，他並未在細節上，著墨土耳其經由教育羅馬字所建立的知識體系、印刷資本、與學習現代化文明的關係。也就是說，我們仍是無法得知為什麼過去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使用的混同語言，不適合表達西方現代化，但純正的民間土耳其語卻可以？

法律執行可以強制改變書寫文字，但無法強迫使用者相信文字語言的改變與國家現代化發展之間正面的關係，並強迫其在私領域文字的使用。這個問題被許多語文改革評論者所忽略。

我認為從譯者的角度出發，文化或是文明的譯介存在精確與否的議題，當然精確度會影響理解，但沒有文化是無法從一個語言轉譯到另一語言的。不同語言間的互譯的確有大小深淺不一的難度，但譯者必須有所衡量地斟酌詞彙使用，或是創造新詞，並給予定義。有些社會語言學者提出，鄂圖曼土耳其時代的語言，除了大量的外來語外，還缺乏科技術語（Heyd, 1954: 108-109），這基本上只要另創新詞或是音譯即可，英語中的 science 與 technology 也並一開始使用英語時便存在，也是經過文化與文明發展的需要而產生。意譯的部份讓國人讀懂、並接受，才是文明移植最大的關鍵。

凱末爾政府在其現代國家主義建立的過程中，其實過度集中注意力於強調語言文字的單一性、企圖與過去政教合一的治理做一分野。另外，新

政府斟酌考量的，主要還是語文改革中所要求識字率提升的問題。過去的阿拉伯文書寫系統，讓土耳其地區識字率久未能提升，主要還是由於阿文無法完整書寫土耳其語，且文字規則本身過於複雜，再者，人民受教育的機會也不均，未能享有國家義務教育。而凱末爾所謂改革所需要倚賴的現代化文明，其實是立基於公民擁有讀寫的能力，才能進而學習西方知識。再者，西方價值、制度、機構、與現代化的移植，也必須有著閱讀知識的能力為前提，公民至少需要有能力能夠讀懂政府公告與宣傳文書，才能夠進一步經由知識（譯介的，或是政府再生產的）吸收文明。

三、語言學會

為了讓文字改革與國家主義概念灌輸更加專業化，凱末爾在 1932 年成立了語言學會（Gallagher, 1971: 165）。在 1931 年底，他便先成立土耳其歷史學會（Society of Turkish History）。學會主要宗旨是要書寫土耳其國家歷史，尤其是鄂圖曼帝國之前的歷史以及早期非伊斯蘭時期的文化。在 1932 年第一次會議後，有會員建議成立土耳其語言學會，於是語言學會順理成章地在當年度成立。根據語言學會成立法第二條，學會須提出土耳其語言獨特的美學與豐富性，並使其與其他世界語言並駕齊驅（Heyd, 1954: 25-27）。為了達成如此學術性的任務，學會會員由不同子領域的語言學家擔任制定、研究並收集民間使用詞彙，進行語言淨化的工作。除了標準化現代土耳其語言的使用外，語料的收集也是剔除外來語彙的方式。那些不在民間使用的語彙，以及有著明顯波斯與阿拉伯語發音與字源的詞彙都遭到淘汰。目的是要篩選出完全的土耳其語言使用字彙，並將外語以及帶有伊斯蘭宗教影響的文化，從語言中連根拔起。

由凱末爾主持創辦的語言學會，得到國會與政府內閣的支持。1932 年 11 月國會便宣布一法案，所有的國家行政組織得一起收集土耳其現行使用語詞，但不包括那些已經編列在字典中的。全國所有的省份應成立子語言學會，來從事相關工作，主要的文字收集者是老師。他們收集後將意思、使用地區、同義、反義詞字表填寫好送到地區語言學會，然後送到中央語言學會彙整，中央語言學會再刪除重覆字彙（Heyd, 1954: 25-31）。

舉國上下的語言運動，成果斐然。1933 年底，中央語言學會已收到超過 125,000 張字表；關於早期資料的部分，同年也收得 150 本以上的書本或手稿，記載了土耳其民間通行語言，但尚未以羅馬字編譯。1930-50 二十多年間，學會則致力於這些資料的出版（Heyd, 1954: 27-31）。

四、語言淨化

Wright（2004: 57-60）對語言純正（purism）的信仰，有一番時代性的解釋。他提出十九世紀民族主義者認為在民族性的建立上，語言扮演表達民族與歷史的角色。而如果每個民族都是獨特且唯一的，那語言也應該是如此，而不應參雜外來語。對語言文字工作者來說更是如此，他們心中對語言使用，存在著一種民族情感的信念，尤其是文學語言，那是他們仿效的對象，膜拜為純正與正統的文化模本，每個民族都必須要有這樣視之為純正的一套語言使用模式，那是文字學者仰賴的文化根源，也被其視為文化想像的共同體，這樣的純正傳統與十九世紀民族主義完美結合，使得語言純正主義在發展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如魚得水，且視為應當。

語言純正主義是凱末爾改革基本意識的一環。土耳其國家主義意識的建立，也亟需正統的文化根源支持。所謂的正統存在於純正民間土耳其語中。語言學家、文字工作者、以及民族國家主義者所支持的正統即是文化傳統，那是所有民族歷經時間政權改變不斷更新、創造、並維持的認同。土耳其語言學會所從事的，就是在語言中尋根的事業。

早期語言學會除了出版字彙集外，主要工作其實是淨化語言，形塑純正的土耳其語（pure Turkish language）（Çolak, 2004: 67）。也就是將波斯與阿拉伯語在民間口語中挑出來，然後替換成民間使用的土耳其語。而藉由收集語料之便，學會可以決定哪些外語使用可以在土耳其語中找到類似，或是等同的語詞相互替換。得來的語料在初步整理篩選後，便進行詞語替換工作。語言教師們發現有些鄂圖曼時期的外語文學用字，其實很難在土耳其口語中找到對等用字。不過，他們仍在五週內完成語彙轉換，在 1934 年出版了《鄂圖曼語彙的土耳其語替換字》（*Collection of Turkish Equivalents of Ottoman Words*），其中，也可看出，其實民間使用的語彙，已經相當大

程度地融進了波斯語與阿拉伯語。此書一出版，獲得許多迴響，包括要求增補與訂正。學會於是在 1935 年將這些土耳其語替換字，列表於報紙上，讓全國人民有機會提出意見。之後根據這些意見，學會再度編撰了《鄂圖曼-土耳其口袋詞語彙編》（*Ottoman-Turkish Pocket Glossary*）。

語言學會一直以來都是支持凱末爾改革的。其語言淨化的目的是為了讓受外語影響的混用語言，徹底被現代土耳其語取代。而取代背後的政治動機，仍是與凱末爾的國家主義教育沆瀣一氣的。學會一直很引以為傲地、不斷拿出來宣傳的一段話即是 Glatasary 中學的學生與伊斯坦堡大學生曾向學會寫信，表達絕不可在語言淨化工作上做任何妥協，他們堅信「在土耳其口語中聽起來最粗俗、沒教養的字，都比和諧的外語字來得悅耳」（Even the most uncouth Turkish words is to is more pleasing than the most harmonious foreign word）（Heyd, 1954: 27-31）。也就是說，學生已經感受到了使用純正土耳其語的必要性與民族使命感。當然這也可能是凱末爾政府在教育體系中，一系列邊緣化伊斯蘭文化的民間反應。在 1933-1935 幾年中，多數伊斯坦堡大學的神學教授被降轉至伊斯蘭研究學院，某些宗教服飾更是禁止在敬拜場所外的公開場合出現。致力於宣傳土耳其國家意識的新政府所要建立的，並非是一個反伊斯蘭的新政權，而是一個新的土耳其化（Turkishization）的國家民族概念與認同的養成。

五、太陽語言理論

學會的貢獻中，最有趣的是 1935 年提出了「太陽語言理論」（Yukseker, 1982: 89-99）。這想法來自凱末爾，其在語言學會的學界朋友則順勢支持並廣為宣傳。此理論訴求將土耳其人民與西方世界文化連結，而連結的方式，則是提出土耳其語言的普世性（universality）。也就是說土耳其語不僅與東歐、中亞國家語言有著密切關係，其與其他古老的語言（如：希泰語 Hittite）關係密切，應視之為所有語言的源頭。

語源關係成為土耳其與世界的交界點，也是語言純正主義的進化表現。太陽語言理論的來源是，學會相信原始人類在尚未有文字之前，曾對太陽發出“Aa”這個聲音，這是最初語言的源頭。在土耳其語言中，Aa 拼寫為

a ğ 指的是太陽、陽光、溫暖、火、權力、神、大師、時間、生命等等（Lewis, 1999: 57-58）。在土耳其語中早已有存在這樣的音與意思，所以土耳其語應為世界上最古老的語言之一，也是影響其他古老語系 （例如：希臘、拉丁語言）重要文明之一。換句話說，土耳其語言與文化是所有文明的正統根源。對土耳其新民來說，追尋正統與純正的土耳其民族性不假外求，其日常語言中，俯拾即是。

太陽語言理論可算是 1930 年代語文改革的高潮。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宣稱與尋求證據支持土耳其語言文化的古老性與根源性，不僅是土耳其共和國進軍西方世界的捷徑，也同時便利了國內淨化語言的語言學工作者。如果證明了世界文化與語言，都是來自土耳其在鄂圖曼帝國之前的遷徙族群，那麼，其實不需要花費心力淨化語言，因為土耳其語是所有語言的源頭，任何文明都與之相關，當前新政府只需要加強其與鄂圖曼前期的歷史連繫。而土耳其語言歷經時間改變、政權轉移、與人為改造，轉化成現代不同的國家民族語言，是可以理解的。這也是本文前半部鋪陳在共和國成立之前，語文發展與政權轉換史的用意。語文改革若是希冀從文化根源尋得認可，那麼，我們是有必要釐清先前的部落族群遷徙、帝國建立之間文明互動與文化交流的關係的。

後來在一次國際會議中，外國語言學家多不支持太陽語言理論，凱末爾便漸漸不再提，而當主事者聲音漸小後，其後方跟隨的腳步也就不再如之前的喧嘩（Lewis, 1999: 66-67）。如果不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待太陽理論的提出，我們其實可以將之視為，凱末爾政權干預學術、公器私用來擴展其國家主義的建立、與個人對語言發展的主張。凱末爾不是語言學家，但其握有的政治權力不僅可改變土耳其人語言歷史的書寫，也可以製造新的學說理論，來迎合其語言純正主義的思維。

伍、對改革的批評與成效評估

統一語言與文字在現代國家的建立上是相當普遍的現象（Çolak, 2004: 70）。1920-30 年代土耳其文字改革，是一場典型的內化國家民族主義長期、

且成功的演出。從高低雙語（diglossia）到單語，從阿拉伯文到羅馬字，共和政府發動全民共同參與，將語言從多語夾雜的、外語充斥的鄂圖曼土耳其語，扭轉至單一語彙使用、並標準化的現代土耳其語。文字上也從過去無法完全表達土耳其語的阿拉伯文轉換為羅馬字。羅馬字的推廣似乎較語言淨化來的簡單，一套過去在書寫口語上困難的文字，很容易被簡易、且能完整表達語言的書寫系統取代。對於文盲來說更是一大福音，因為，相較之下，阿拉伯文學習較費時；而對精通阿文的知識份子而言，只要願意學，也非難事。

多數的評論與文章，鮮少提到對土耳其語言文字改革的批評。即是有，也多是意識型態與情緒層次上的，且這些批評主要是針對語言學會，非凱末爾個人。例如：有些人自小即使用的字彙，已經成為語言習慣，他們不願意更改（即使富含外來語彙），雖然語言學會已經傾全力，找出土耳其口語中同等對應字，或是創造新詞，但對小說家或文字工作者而言，在尚未習慣使用對等字之前，他們擔憂學會將一改再改語彙，而使得他們的作品讀起來不連續，或是擔心未來土耳其子民，讀不懂他們鄂圖曼土耳其語的創作（Heyd, 1954: 44-48）。對於某部分語言學家來說，任何對文字的改變，都會影響人民每日的生活作息與人文生活（Çolak, 2004: 71）。

另外，學會成為一個強制執行語言淨化的組織，也是令人垢病的。反對者認為，造新字的工作應留給作家或是詩人，但學會卻與公權力聯手，強迫公部門與教育體系使用新語彙。另一批人似乎更強烈地表達不滿，他們認為過去的鄂圖曼土耳其語，雖然外語繁多，但有著自成一體的和諧，學會美其名為簡化語言，但其實暴力地將新的語言文字系統，不經眾人同意之下，擅加普及，並且造成了兩代之間溝通上的困難。他們批評學會所做的改變，幾乎新創了一種語言、一種民眾不使用的口語，像是在同一個空間中，有著不同的語言使用群體。在過去，雖然每個人都說土耳其語，語彙以及發音可能都不同，基本上仍是可以溝通的（Bingol, 2009: 40-52）。孩子在學校習得新語後，無法與家人溝通，而使用鄂圖曼土耳其語的人，也無法理解報章媒體的內容（Heyd, 1954: 46-47）。

這些反面意見是所有國家推動的語文改革中，都會產生的共同問題，

而這也是土耳其改革的優勢之一。土耳其語文改革是一種由官方主導的革命，在執行與強制力上，比民間發起有效率許多。即便有反對聲浪，國家機關仍可繼續執行，而民間抗議的聲音雖有，多數仍持著改革有所必要的態度，因此也未有集體性的反抗出現與政府的改革相抗衡。

通常被語文改革學者關注的問題在於評估改革成功與否，而此問題的解答可從兩方面著手。一是統計語言使用人口的改變，如：1927 年的全國識字率僅有 10.7%，1940-41 已到達 22.5%（葉俊呈，2013：86）。Wright 也同意 1920s 的土耳其語文改革可算是成功的，因為當時文盲較多，語言文字的改變，只對某一部份知識分子產生影響，對多數文盲人口來說，影響並不大（Wright, 2004: 52）。再者，1933 年全國報紙的投稿統計上，只有百分之三十三的現代土耳其語，但到了 1970 年，已經增加到了百分之七十。另外，也可以從暢銷熱門小說使用的語彙來看，例如 Yasar Kemal（1923-2015）的小說中，百分之八十四使用土耳其語（Spearman & Turfan, 1979: 95）。另一評估方式，是現代土耳其語言與文字是否能使用於文學創作與科普新知文章，吸收西方科學新知，這原本即為改革的初衷，也就是西方化與現代化，故新土耳其語文當然適用於各類型文體的使用。

Coulmas 分析土耳其語文改革成功的原因有二：一為呼應 Wright 的看法，認為當時文字改革並不會影響多數人，反而增加文盲識字的機會。另一原因是，當羅馬字被推出來時，以一種強化國家意識高於宗教的姿態出現，強調改革的目的是要創造一種優美、高階的世界文字。羅馬字這時便由國家機關提出，並向人們推銷，說明羅馬字已經通過了世界的認可，而阿拉伯文，礙於無法完整呈現土耳其語，所以是不適合成為世界語文的（Coulmas, 1989: 242-44）。這對當時有心邁向現代化的知識菁英與平民百姓而言，不僅打了一劑強心針，也強化了土耳其人期許未來與西方世界共榮的信心。

陸、結語

語言與書寫都是一種權力機制的支配。國家機關可扮演一種全面性、強壓式的符號機制。如同土耳其官方改革，國家機關在語言與書寫場域，不僅擁有文化與印刷資本，更具備標準化與法典化的公權力。土耳其國家民族意識的建立，在 1920-30 年代土耳其語文改革中，扮演決定性角色。「土耳其人」在凱末爾政府的定義下，被塑造並教育。而其所形塑的土耳其人的民族性，是與過去伊斯蘭傳統切分，並與西方文明連結的。能夠成功地將語文改革透過語言學會的標準化與語言純化策略實踐於學校與社會教育中，凱末爾得利於其背後官方機制與國會勢力的政治支持。

參考文獻

汪宏倫。2004。〈將漢字羅馬化：一個「跨語際實踐」的文化政治學分析〉《台灣社會學》7 期，頁 123-76。

吳興東。2003。《土耳其史：歐亞十字路口上的國家》。台北：三民書局。

咎濤。2011。《現代國家與民族建構：20 世紀前期土耳其民族主義研究》。中國北京：新知三聯書店。

張學謙。2014。〈從外國字到國語字──民族主義、現代化與越南羅馬字政策〉《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0 卷，1 期，頁 1-28。

彭世綱。2005。〈近代土耳其文改革運動後──土耳其文中的阿拉伯文外來字研究〉收於國立政治大學伊斯蘭文明及思想中心（編）《中東與伊斯蘭論文集──現代穆斯林政治、社會、文化的變遷》頁 105-106。台北：中華民國民國阿拉伯文化經濟協會。

葉俊呈。2013。《土耳其改革與民族認同──從語言邊界切入分析》碩士論文。台北：政治大學民族學研究所。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Akgündüz, Ahmed, and Said Öztürk. 2011. *Ottoman History: Misperceptions and Truths*. Rotterdam: IUR Press.

Aksakalv, Mustafa. 2008.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in 1914: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xiarlis, Evangelia. 2014. *Political Islam and the Secular State in Turkey: Democract, Reform, adn the Justic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London: I. B. Tauris.

Bingol, Yilmaz. 2009. "Language, Identity and Politics in Turkey: Nationalist Discourse on Creating a Common Turkic Language." *Turk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8, No. 2, pp. 40-52.

Bourdieu, Pierre, and John B. Thompson.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uruma, Ian, and Avishai Margalit. 2004. *Occidentalism: The West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 New York: Penguin Press.

Carrier, James G. 1995. *Occidentalism*: *Images of the West*: *Images of the Wes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tterji, Nikshoy C. 1973. *Muddle of the Middle East*. New Delhi: Abhinav Publications.

Coulmas, Florian. 1989. *The Writing Systems of the Worl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Cole, Juan Ricardo. 1992. *Colonialism and Revolution in the Middle East: Social and Cultural Origins of Egypt's 'Urabi Move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Çolak, Yılmaz. 2004. "Language Policy and Official Ideology in Early Republican Turke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0, No. 6, pp. 67-91.

Davison, Roderic H., and Clement H. Dodd. 1998. *Turkey: A Short History*. Huntingdon, England: Eothen Press.

Deringil, Selim. 199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as Public Image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1808 to 1908."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5, No. 1, pp. 3-29.

Dogancay-Aktuna, Seran. 1998. "The Spread of English in Turkey and its Current Sociolinguistic Profile."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Vol. 19, No. 1, pp. 24-39.

Douançay-Aktuna, Seran. 2004. "Language Planning in Turkey: Yesterday and Toda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Vol. 165, pp. 5-32.

Diringer, David. 1948. *The Alphabet: a Key to the History of Mankind*.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Eastman, C. M. 1983. *Language Planning: An Introduction*. San Francisco: Chandler & Sharp.

Erdal, Marcel. 2004. *A Grammar of Old Turkic*. Leiden: Brill.

Fasold, Ralph. 1984.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Socie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Finkel, Caroline. 2006. *Osman's Dream: The 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923*. New York: Basic Books.

Fishman, Joshua A., Charles A. Ferguson, and Jyotirindra Dasgupta. 1968. *Language Problems of Developing Nations*. New York: Wiley.

Fishman, Joshua A. 1969. "National Languages and Languages of Wider Communication in the Developing Nations."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Vol. 11, No. 4, pp. 111-35.

Fishman, Joshua A. 1970. *Sociolinguistics: A Brief Introduction*.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Fishman, Joshua A. 1971. "The Impact of Nationalism on Language Planning: Some Comparison between Early-Twentieth Century Europe and More Recent Years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in Joan Rubin, and Björn H. Jernudd, eds. *Can Language Be Planned?* pp. 3-2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Gallagher, Charles F. 1971. "Language Reform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in Turkey," in Joan Rubin, and Björn H. Jernudd, eds. *Can Language Be Planned?* pp. 159-78.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Grousset, René. 2010.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Gökalp, Ziya. 1968. *The Principles Of Turkism*. Leiden, E.J. Brill.

Goffman, Daniel. 2004. *Th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nioğlu, M. Şükrü. 2008.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eyd, Uriel. 1954. *Language Reform in Modern Turkey*. Jerusalem: Israel Oriental Society.

Helmreich, Paul C. 1974. *From Paris to Sèvres: The Parti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at the Peace Conference of 1919-1920.*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Hertslet, Edward. 1891. *The Map of Europe by Treaty*, IV (1875-1891).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https://archive.org/stream/mapofeuropebytre04hert#page/2758/mode/2up) (2015/9/23)

Imber, Colin. 2002.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50: The Structure of Pow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Islam Heritage Project. n.d. "Translations of the Ottoman Constitutional Laws: The Wilayet Administrative Law, the Municipal Law and Various other Laws." (http://ocp.hul.harvard.edu/dl/ihp/004116895) (2015/9/19)

Kinross, Patrick, and Baron Balfour. 1979. *The Ottoman Centur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urkish Empire*. New York: W. Morrow.

Kosmarskii, A. A. 2007. "How Is It Possible to Speak of Latinization?" *Anthropology and Archeology of Eurasia*, Vol. 46, No. 1, pp. 68-74.

Lewis, Bernard. 1961.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wis, Geoffrey. 1999. *The Turkish Language Reform: A Catastrophic Succ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addel, Mansoor. 2005. *Islamic Modernism, Nationalism, and Fundamentalism: Episode and Discours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rr, David G. 1981. *Vietnamese Tradition on Trial: 1920-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Ö ney, Banu, and Aydin Yucesan Durgunoğlu. 1997. "Beginning to Read in Turkish:

A Phonologically Transparent Orthography."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Vol. 18, No. 1, pp. 1-15.

Quataert, Donald. 1979. "The 1908 Young Turk Revolution: Old and New Approaches." *Middle East Studies Association Bulletin*, Vol. 13, No. 1, pp. 22-29.

Scharlipp, Wolfgang. 2000.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urkish Runic Inscriptions: A textbook in Turkish and English*. Engelschoff: Verlag Auf dem Ruffel.

Shohamy, Elana. 2006. *Language Policy: Hidden Agendas and New Approaches*. Abingdon: Routledge.

Spolsky, Bernard. 2004. *Language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Şentürk, Recep. 2010. "State and Religion in Turkey: Which Secularism?" in Michael Heng Siam-Heng, and Ten Chin Liew, eds. *State and Secularism: Perspectives from Asia*, pp. 319-37. Hackensack, N.J.: World Scientific.

Spearman, Diana, and M. Naim Turfan. 1979. "The Turkish Language Reform." *History Today*, Vol. 29, No. 2, pp. 88-97.

Tachau, Frank. 1964. "Language and Politics: Turkish Language Reform." *Review of Politics*, Vol. 26, No. 2, pp. 191-204.

Trencsényi, Balázs, and Michael Kopeček. 2007. *National Romanticism: Formation of National Movements*.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Unseth, Peter. 2005. "Sociolinguistic Parallels between Choosing Scripts and Languages." *Written Language and* Literacy, Vol. 8, No. 1, pp. 19-24.

Wikipedia. 2016. "Demographics of Turke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mographics_of_Turkey#Population) (2016/3/16)

Wood, Margaret M. 1929. "Latinizing the Turkish Alphabet: A Study in the Introduction of a Cultural 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5, No. 2, pp. 194-203.

Wortham, Hugh Evelyn. 1930. *Mustafa Kemal of Turkey.* New York: William Edwin Rudge.

Wright, Sue. 2004.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From Nationalism to Globalis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Yılmaz, Kaya. 2011.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Alphabet and Language Reforms Implemented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Turkish Republic."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Education Research*, Vol. 2, No. 1, pp. 59-82.

Yukseker, Hitay. 1982. "Turkish Language Reform: An Early Example of Language Planning." *Toronto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Vol. 3, pp. 89-99.

The Imagined Communities in Atatürk's Language Reforms and Their Evaluations

Huang-Lan Su
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Syracus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history of Turkish languages and its relation with different political powers. It mainly tackles how the 1920s-30s Turkish language reforms by Mustafa Kemal Atatürk (1881-1938) related to the tradition of caesaropapism and how the relation thus impacted on his language policies. Following the conception of "print capitalism,"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actice of how Atatürk and his followers made good use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public power and print culture to reproduce the knowledge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and practice, the Turkish imagined communities were shaped, the Turkish people and culture were modernized, and the Turkishness was (re)defined.

Keywords: Mustafa Kemal Atatürk, Turkish language and writing, language reforms, Romanization, print capitalism, imagined communities